

评战后日本对华侨华人问题的若干研究

郭 梁

关于华侨、华人社会

华侨、华人社会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华侨社会结构、华侨团体、帮派、华侨人口变迁、华人社区、唐人街、华人的家庭与婚姻、华人宗教信仰、华人风俗习惯、华侨秘密会社等等。战后在日本出版的研究华侨社会的著述,择其重要者可以举出下列数种:内田直作的《日本华侨社会研究》(1950年),吴主惠的《华侨本质的分析——华侨的社会学研究》(1961年),河部利夫的《东南亚华侨社会变动论》(1972年),中村孝志编《东南亚华侨社会》(1972年),戴国辉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1972年),戴国辉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上、下)》(1974年)、《华侨: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苦闷与矛盾》(1980年),中村孝志《马来西亚华人的都市与村落》(1981年),山下清海的《东南亚唐人街》(1987年)等等。

吴主惠的《华侨本质的分析——华侨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初版于1961年。^①该书作者是社会学家,先后担任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教授。他认为,华侨是世界上有着最为强烈的民族背景的移民集团,应该从民族社会学角度去把握华侨的本质。所谓民族社会的本质,即是一个民族自身内在的固有的血缘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看法也可以称为“血缘文化关系论”。从这个理论出发,作者认为华侨社会的本质是以家族和帮为基础的社会,或者说是由地缘和血缘关系构成的“帮式社会”。作为一部社会学研究著作,本书较为全面和深入地分析了华侨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华侨的社会结构,华侨思想意识的基础,华侨社会的概念和本质,华侨资本的实体,华侨的精神结构,华侨与祖国的关系等等。但是,本书过份强调了华侨社会自身的“有机整体”,忽视了华侨社会与居住地社会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而对于战后华人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则未曾涉及,观点未免显得陈旧。

较早对战后华侨社会的变化提出见解的是河部利夫和戴国辉。河部利夫是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他对“华侨社会不变论”持批判态度,主张“华侨社会变动论”,并提出了“第三民族社会形成论”。他主编的《东南亚华侨社会变动论》一书集中的代表了他的观点。^②他认为,东南亚华侨社会正走向融合化和定居化,这使它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土著社会和华侨社会,正进行着文化的、社会的融合,而两个社会的融合,产生了形成新的第三民族社会的趋势。不过,他认为东南亚各国“融混”的程度并不一样,泰国是高度“融合社会”,马来西亚是并存关系的“复合社会”,菲律宾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混合

社会”。

戴国辉教授现任于日本立教大学,研究华侨、华人的著述颇丰。他主编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上、下两册,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东南亚华人社会、经济研究会”1971—1972年的终结报告书。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开始了创建新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进程,面临这一新的环境变化,华侨是如何去适应的?该书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戴国辉认为,应区分“华侨”与“华人”的不同含义。战后以来,过去被称之为“华侨”的大部分人在居住国的剧烈变化中,已被迫或自愿地成为居住国的华人系居民。在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前被称为“华侨”的人们现在自称“华人”,把自己与保留着中国人形象的华侨严格区别开来。对这些华人血统公民的新的生活准则,编者认为:华人、华裔在家庭生活、风俗习惯、宗教观、价值观等方面,尽管还未能完全脱离中国的传统影响,在文化上还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怀乡病,但是他们今天的生活原则已不是停留在“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而是选择了作为居住国的一员,积极地为所在国建设做贡献的生活原则。所以,应该从“华人”的角度研究他们在东南亚居住国建国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正确树立他们的真实形象;同时要研究、阐明从华侨向华人转变的历史过程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要做到这点,必须把华人问题放在东南亚居住国的建国过程中,放在居住国本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的结构中去研究,否则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要达到作者阐明的要求,本书还嫌不足,然而,从明确地提出了华侨研究的新的方向来说,该书不啻为先驱著作之一。

关于华侨社会变化的研究,戴国辉教授的另一著作《华侨——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苦闷与矛盾》也很值得一读,^④该书汇集了作者十余年来研究华侨、华人的成果,其基本观点主张应将华侨、华人作为当地的少数民族问题来研究,认为多数民族不应该用同化、融合、统合来对待华人少数民族,而是应该尊重华人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特性,在平等的立场上共同塑造新的国家形象。

关于华人社区变迁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唐人街的研究方面,出版了山下清海的《东南亚的唐人街》、鸿山俊雄的《海外中华街》、菅原一孝的《横滨中华街研究》、菅原幸助的《横滨中华街的变化》等著作,另有研究中华街的多篇论文发表。山下青海先生是从人文地理角度研究华人社区的青年学者,成果引人注目。他毕业于筑波大学地理学系,获博士学位,1978—1980年又曾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从事两年研究,通晓汉语,以后多次到东南亚地区实地调查、访问,1987年完成了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中华街(华人居住区)的研究、考察,写有《新加坡的华人社会》(1988年)、《东南亚的唐人街》(1990年)等学术著作,还发表过研究新加坡海南帮、新加坡华人方言集团的居住格局,以及研究东马(来西亚)山打根华裔可可种植园农业、东马沙捞越华人方言集团分布格局的形成、侨乡广东潮州地区的社会地理学考察等多篇论文,是近年来日本学术界

出现的仅有的几位研究华侨、华人的青年学者之一。

太田勇、今富正己、谷口房男三位学者合编的《东南亚华社会的变貌》一书,^⑧是一本分专题叙述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的有份量的著作,其优点在于书中内容都是作者经过实地调查后(有的是作者多次深入东南亚国家调查)写就的,资料比较翔实,例如书中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学校教育的章节,对马华华文教育的发展变化作了系统叙述,很有参考价值。

关于华侨、华人历史

日本学术界研究华侨史素有传统,战前的华侨史研究,与中国史的研究结合较为紧密,多利用中国史料或资料;战后的研究中,注意到把华侨史的研究与东南亚各国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并着重从当地社会和华侨在海外的活动方面开拓新史料。作为有特色的华侨史研究,可以举出下列有代表性的著述。

京都大学日比野丈夫等学者为研究马来西亚华侨曾多次到当地进行实地调查,以发掘新的资料。他以墓志碑铭为调查的中心,广泛搜集其它文字和实物资料,在1969年发表了《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的系谱》一文,以后又发表了《东南亚汉文碑刻》等文章,^⑨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另一位在研究马来西亚华侨史方面受到高度评价的是今堀诚二教授。今堀先生曾任广岛大学教授、广岛女子大学校长,是知名的东洋史学家。早在四十年代,今堀先生就曾到中国华北进行实地考察,出版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东洋社会经济史概论等著作,对于中国国内的商业基尔特(会馆)和其他社会团体有相当的研究。战后,在1966—1972年期间,他曾三次到马来西亚进行华人历史社会调查,并将调查所得写成《马来亚的华侨社会》一书。^⑩这部专著的内容是有关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地华人社团史的论述和考证,例如关于华侨商业、手工业基尔特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关于华侨血缘、地缘、行业组织沿革的研究和考证等等。今堀先生认为,华侨移民南洋,除了加入基尔特的集团中生活,别无生存之道,而这种生存方法,又是中国人从四千年历史中学习得来的智慧。马来亚各地华侨的同乡团体林立,一面是藉以维持与故乡的关系,而同时又是在侨居地加强同乡团结的据点。于是,中国的社会体制因此而带进於会馆的组织中,家长制统治和共同体体制成为华侨社会的支柱。在资料的运用上,今堀先生尤其重视华侨社会保留和遗存下来的第一手资料。他在当地的侨史调查中广泛搜集碑文、祭器、匾额、吊钟、香炉,以及会馆特刊、章程、捐款芳名录等等,从中分析、掌握华侨社团的单位、组织结构、性质、历史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纠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该书中译本的译者刘果因在序言中说:“本书最值得令人敬服的,是处理资料的方法,竟从千头万绪中,找出了华侨社会的真相。”^⑪今堀先

生的研究是继根岸佶之后关于华侨基尔持研究的代表性著述,也是研究马六甲、槟榔屿、新加坡华侨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中国近代的契约华工问题,是华侨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从战前开始,日本学者对此已有所涉及,例如成田节男《华侨史》专门设有一章“苦力贸易”,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中也有专门章节论及;战后,有更多的著述讨论过契约华工问题,例如须山卓的《华侨经济史》,就有殖民地奴隶制度和中国人苦力贸易问题的详细研究;田川一已撰有论文《十九世纪马来西亚华人契约移民的特点》等等。但是,作为日本研究契约华工问题的专门著作,可儿弘明的《近代中国的苦力和“猪花”》是第一部书。^⑧

所谓“猪花”是苦力贸易(亦称“猪仔”贸易)中被贩卖出洋的“妇女”。生活在旧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在契约华工大量出国时期,也在暴力或诱拐之下,被大量贩卖到美国、东南亚一带。她们在海外被奴役、被侮辱的厄运,曾有些学者作过零星研究。而一般的契约华工研究著述,则没有注意到这一群体的存在。可儿弘明博士的研究另辟蹊径,他利用香港“保良局”的档案文书,探讨了“契约华工”问题的一个侧面——所谓“猪花”现象的来龙去脉,写成了一部中国妇女被拐出洋的血泪史。可儿先生现任庆应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香港问题研究,著有《香港的水上居民——中国社会史的横断面》,主编了《香港和香港问题研究》等著作。1972年他到香港调查历史上日本卖春妇在海外的情况时,无意间发现了堆在香港保良局仓库内的文书档案。这些档案始自保良局创办之时,有光绪八年(1882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之间的文书115册,民国初年至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文书155册,共计270册。档案尽是中国妇女被拐卖的辛酸记录,包括被拐卖妇女的供述笔录,及其街坊邻里、亲戚、人口贩子嫌疑犯的口供等,还有调查报告、处理经过,是完全真实的宝贵资料。可儿教授检阅这些档案,利用这些资料,在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被贩卖妇女的不同类型后(例如也有少数广西妇女被贩卖),认为近代以来长期存在于广东地区的“猪花”买卖现象,是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在亚洲进行的殖民地化、半殖民地所造成的近代华侨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也是中国国内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因此可以说“猪花”现象是双重剥削下的产物。该书还用较大篇幅论述了香港“保良局”的设立和作用,他认为“保良局”作为英国殖民者统治香港的补充机构,其真正目的并不在于保护妇女,而实际上在于使妇女自觉地遵守建立在传统封建妇道基础之上的生活规范。可儿先生的著作不仅深化了关于契约华工问题的研究,而且涉及华侨史、妇女史、社会史和殖民地史的领域,引起了日本史学界较大反响,被誉为“开垦了一块处女地。”^⑨中国学者已将他的这部著作译成中文出版。

如何利用西文资料对古代华侨史的某些史实进行考证,日本研究南洋史的学者岩生成一发表的《关于下港(万丹)的中国街》、《安汶岛(Amboina)初期的中国街》等论文提供

了很好的样板。^⑩例如在《关于下港(万丹)的中国街》一文中,作者把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等中文史料与荷兰殖民者的记载、西方人的航海旅行记等进行比较、印证,并参照当时西方人所绘地图,考证了16世纪末至18世纪80年代爪哇下港(万丹)唐人街的兴衰过程。全文由七个部份组成,即明末中国人对南洋贸易的进展、下港的开港、下港唐人街的位置和规模、下港唐人街的贸易、下港唐人街的重建、下港唐人街的迁移、下港唐人街的衰落(附唐人街的自治)。从万丹唐人街的变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中国移民与南洋贸易的密切关系,中国商人在爪哇由“行商”变“住商”的过程,华侨在当地胡椒贸易和经济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华侨社区的生活状况,华侨与原住民族的关系,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掠夺对下港的影响等等,是一篇颇有学术价值的华侨史个案研究论文。

作为富有特色,并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华侨史成果,还可以举出下列领域的研究:和田久德关于早期东南亚华侨社会历史的研究;^⑪长冈新治郎、中村孝志等关于荷属东印度公司时期华侨历史的研究;^⑫山本达郎、藤原利一郎关于越南华侨史的系列研究;^⑬永积昭、白石隆关于二十世纪初期印尼华侨的研究;^⑭中川学关于客属华侨历史的研究;^⑮明石阳至关于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研究等等。^⑯上述研究成果受到华入学者的重视,一部份论著已被译成中文发表。

关于日本华侨、华人

日本的外国侨民和后裔,以韩国和朝鲜人最多,现有70万人左右。其次是华侨、华人,约7万人左右。对旅日朝鲜人的研究,已有许多专著和论文发表,据不完全统计,八十年代仅有关著作即达80余种,还有专门的定期杂志如《朝鲜资料月刊》等出版发行。有关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虽远不及研究旅日朝鲜人的规模和声势,但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早在五十年代,内田直作教授的《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内田教授的研究开始于1942年,其时已经对日本华侨社会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战后初期继续未完的研究工作,终于写就了一部分分析、论述日本华侨社会经济组织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该著作在理论上继承了根岸佶博士关于华侨社会经济组织的本质是基尔特的观点,但却以历史的实证方法达到了华侨基尔特研究的最高峰。全书分为三大部分:(1)序编:留日华侨的人口与经济;(2)江户时代的华侨团体(四大唐寺、通事会馆、办铜贸易商人团体、八闽会馆);(3)后编:明治以后的华侨团体(公所团体、中华会馆、中华总商会、职业团体)。各编都详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华侨团体建立的经过、团体的结构、职能分析以及综合考察,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描绘出日本华侨社会发展史的明晰画卷,也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本书是“日本华侨社会的自治集团生活的记录。”^⑰六十年代,由文部省科研经费支持的横滨四大学(横滨市立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神奈川大学、关东学院大学)对横滨华侨进行的社

社会学调查,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例如早濑利雄教授的《华侨社会研究的诸问题(1—4)——战后日本华侨的状况调查》、山口长男教授的《横滨中华街的生态研究(1—3)——中华街华商的经营形态》、长田五郎和田仲益见的《旅日华侨经济动向(1—3)——以〈华侨经济年鉴〉为中心》、长田五郎的《留日华侨的人口和职业统计(1)、(2)》、山村周平和河村十寸穗的《关于横滨旅日华侨特点的若干考察(1—2)》等等。此外,杜驹的《日本华侨的政治态度》一书,李献璋、中村质教授关于日本华侨史尤其是长华侨史的研究,细川廓真和乌勒吉关于华侨教育问题的研究,都各有特点,深化了日本华侨问题的研究。七十年代,又出版了菅原幸助《日本的华侨》、鸿山俊雄《神户大阪的华侨》等著作。到了八十年代,日本学者对旅居本国的华侨、华人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有8种著作和25篇论文问世,在日本对华侨、华人领域的整个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一书,^⑩集中了有关日本华侨研究的最新成果,书中10篇论文,就日本华侨近百年的发展史,日本华侨移民的历史背景、移民集团的认同以及旅居日本后的社会移动等作了探讨,涉及到日本华侨的社会经济、教育、社团、侨领、风俗、文化、宗教信仰、归化等多种问题,文章都是在大量访问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具有资料和学术价值。其中如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斯波义信教授的《在日华侨与文化摩擦——以函馆为例的研究》,就是本书中的上乘之作。该文分五个阶段详述了北海道函馆华侨自1859年以来的历史,对“商人型移居类型”的华侨作了深入的探索,并出版了“函馆华侨资料集”。对“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的研究表明,作为日本的少数民族集团,它一方面要顽强地保留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抗拒本地文化的同化或融合,并且同化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

对日本华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八十年代有了较大进展。其中有关神户著名侨商吴锦堂的研究,有关长崎华侨“泰益号”资料文书的研究卓有成效。吴锦堂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华侨实业家、爱国侨领,曾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对家乡也有重要贡献。当然,作为实业家,他与日本的财界、工商界也有密切关系(如与日本三井财团的关系等)。大阪大学文学部山口政子的论文“神户华侨吴锦堂(1854—1926)”^⑪和神户大学中村哲夫的著作《移情阁遗闻——孙文与吴锦堂》,^⑫资料丰富,而且都从较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去研究和评价吴锦堂的一生,尤其是吴锦堂先生在日本的经营发展史,很有参考价值。

关于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⑬是日本华侨经济史研究在战后以来取得的重要进展。“泰益号”(1901—1959年)是福建金门籍华侨陈国梁、陈世望父子创办和经营的大商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业务兴盛,与大陆、台湾、东南亚、香港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在长崎华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经营者陈世望(1869—1940)在清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一直是颇有声望的侨领,担任历届华侨商会要职。基于上述原因,该商号保存了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资料。1982年5月,陈氏家族经过商讨后,由陈世望之孙陈东华代表

向长崎市立博物馆捐赠了保存下来的“泰益号”全部有关资料,共计3,368册。其中包括了“泰益号”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贸易书简、各类帐册、商业文件、长崎福建帮会文书,以及长崎华商与中国政府、华侨学校、唐寺之间的来往文书资料等等,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为丰富、最为完整的日本华侨商号资料。日本史学界有关学者十分重视这批“无价之宝”,围绕这批珍贵的原始资料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1984年,宫崎大学市川信爱教授等成立了“长崎华侨研究会”,向日本文部省申请研究经费,进行整理资料和举办研讨会的学术活动;1989年又成立了“九州华侨华人研究会”,与中国大陆、台湾的学者合作,扩大研究领域,并在日本国内外相继召开了多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使“泰益号”的研究不断深入。到1991年,该项研究已取得了较重要的成果,其中日本学者发表的论著有:市川信爱、杉村邦夫合著《长崎华商泰益号文书的研究——序章》,^①市川信爱编《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资料一览》、《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文书研究之二》、《关于近代日本华侨社会的系谱和展开的研究(资料篇)、(分析篇)》、《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书简目录》等,^②以上收录了山内正博、芙美子关于“八闽会馆的计帐收支一览”、福宿孝夫关于“八闽会馆总簿”的研究、黑木国泰关于“福建会馆总簿”的研究、增田史郎亮关于长崎华侨时中学校的研究、许紫芬关于长崎华商经营帐簿的研究成果等等,其中,许紫芬是最早利用庞大数量的经营帐簿研究商号经营活动的先行者,其成果值得评价。另有台湾旅日学者朱德兰关于“泰益号”与日据时期台湾贸易往来的系列研究,中国大陆旅日学者廖赤阳关于长崎华商“泰益号”的贸易网络研究等,都有可喜的成果在历届学术讨论会或刊物上发表。^③通过对“泰益号”资料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华侨商业的发展轨迹,而且可以深刻了解近代日本华侨社会的全貌,包括经济经营活动、社团组织、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以及与中国的关系,与居住地的关系等等,是很有意义的实例研究。目前,有关“泰益号”的研究已在资料的整理上下了很大功夫,初步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人们期待着新的深层次的研究成果问世。

旅日华侨陈正雄先生利用业余时间,长期致力于日本华侨的研究,他的论文“从统计看日中国人”发表后,^④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该文使用了日本官方发表的大量统计资料,如法务省编印的《在留外国人统计》、《出入国管理统计年报》以及《国际人流》杂志等公布的统计数字等,分析了战后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在日中国人的动向,指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华侨、华人在国籍、婚姻、籍贯构成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完全是与中日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相联系的。从大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出发,探讨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及其原因,正是本文的特点和优点。

注:

①吴主惠《华侨本质的分析——华侨的社会学研究》,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出版,1961年,东京。1973年,该书更名为《华侨的本质——社会学的研究》,由东京青也书店出版。

②河部利夫《东南亚华侨社会变动论》，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1972年3月，东京。

③戴国辉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上、下），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1974年，东京。

④戴国辉《华侨——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苦闷与矛盾》，研文出版社，1980年，东京。

⑤太田勇等《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变貌》，东洋大学1981年度特别研究报告书，1982年出版。

⑥日比野丈夫《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的系谱》，《东南亚研究》第六卷，第4期，1969年，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出版；《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系谱补遗二则》，《东南亚研究》第九卷第1期，1971年，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出版。

⑦今堀诚二《马来亚的华侨社会》，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1973年，东京。

⑧今堀诚二原著、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印行，1974年。

⑨可儿弘明《近代中国的苦力和“猪花”》，岩波书店，1979年，东京。

⑩〔美〕《世界日报周刊》，1993年5月30日。

⑪《东洋学报》第31卷第4期，1949年，东京，东洋学术协会；《东洋学报》第33卷第34期，1951年，东京，东洋学术协会。

⑫和田久德：《东南亚初期的华侨社会》（《东洋学报》第42卷，第1期，1959年）、《东南亚华侨社会的成立》（筑摩书房《世界历史》第13卷：《南亚世界的展开》，1961年）、《从历史上看东南亚华侨》（《东洋学术研究》，第5卷，第4期，1966年）、《十五世纪初苏门答腊的华侨社会》（《御茶水女子大学文科纪要》，第20集，1967年）等等。

⑬长冈新治郎：《荷兰对巴达维亚华侨社会的法律限制》（山本达郎编《东南亚权力结构的历史考察》，竹内书店，1969年）、《十七、十八世纪巴达维亚糖业与华侨》（《南方史研究》第2期，1960年）；中村孝志：《论巴达维亚华侨的包税制度》（《东洋史研究》，第28卷，第1期，1970年）等。

⑭山本达郎：《河内华侨史料》（《南方史研究》，第1期，1959年）；藤原利一郎：《广南阮氏和华侨——特别是阮氏对华侨的方针》、《安南阮氏王朝统治下的明乡问题——特别论述税制问题》（《东洋史研究》第10卷5期、第11卷2期）、《越南各朝对中国移民的政策》（《亚洲纪事》东方文化研究所报，第18辑，1970年）等等。

⑮永积昭：《中华民国成立时期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动向》（河部利夫编《论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变动》，亚洲经济研究所，1972年）；白石隆：《爪哇华侨运动（1900—1918），“复合社会”的形成（一）、（二）》（《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第二辑、第三辑，1972年、1973年）等。

⑯中川学：《关于中国、东南亚地区客家人的历史地位》（《一桥论丛》第9卷第4期，1973年）、《华人社会与客家史研究的现代课题》、《嘉应五属客家简史和现状——马来西亚、新加坡嘉属会馆联合会及其奖学制度》（戴国辉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上）（下），亚洲经济研究所，1974年）、《客家世界大会的历史推移》（《一桥论丛》，1983年第3期）等等。

⑰明石阳至：《南洋华侨救国运动（1937—1941）》（英文），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南洋华侨与满洲事变》（《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第1期，1971年）；《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1941—1945）》（英文），《东南亚研究》第一卷，第2期，新加坡，1970年。

⑱内田直作《日本华侨社会研究》，同文馆出版，1949年，第1页，东京（下转第76页）

等交换是1880年以后的事,这也就是说垄断是国际生产价格形成的条件。尽管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必然。因而,当代资本的国际流动并非全部出自国际垄断资本,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生产的国际化。这意味着垄断并非国际生产价格形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垄断可以凭借它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绝对优势来左右国际价值和世界市场价格(这并非一定是垄断价格)。国际价值虽是公正尺度,却是不平等关系的历史结果。这就是垄断和国际生产价格的关系。

(二)垄断是国际垄断价格形成的必要条件,是不平等交换的实质。中心对生产的垄断是通过贸易的价格垄断和市场份额的控制来实现的,流通领域的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使外围高进低出,贸易条件恶化,而垄断资本通过超过国际价值的销售和低于国际价值的购买获得了从外围转移来的超额剩余价值,这是垄断资本在世界进行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它在中心-外围关系中所体现的是一种原始积累的特点,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

注:

- ① 诸葆一.张幼文:《世界经济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 ② 《马恩全集》第23卷,第354页;
- ③ 同上书;
- ④ 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8页;
- ⑤ 同上书;
- ⑥ 田中素香:《西欧的国际价值论战》,《世界经济译丛》,1981年第6期。

(上接第50页)

- ①⑨ 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东京,严南堂出版,1983年。
- ②⑩ 《日本华侨与摩擦》,第257—286页。
- ③⑪ 中村哲夫《移情阁遗闻——孙文与吴锦堂》,阿明出版社,1990年,东京。
- ④⑫ 参阅朱德兰《近代旅日华商泰益号关系资料研究简介》,《海外华人研究通讯》第1期,1992年,台北。
- ⑤⑬ 日本宫崎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57号,1985年。
- ⑥⑭ 日本宫崎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986年、1987年、1988年各期,长崎华侨研究会1985年、1990年刊印资料。
- ⑦⑮ 同②。
- ⑧⑯ 《社会学杂志》,1990年第7期,神户大学社会学研究会出版。